

# 军事文艺要把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陈 曦

在100多年前国运衰颓的晚清，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魂安在乎”？他声称自己四处求索，却“查不可得”，于是急切地发出了“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的呼号。“中国魂”，或曰“民族魂”“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若在一个朝代已经踪影难觅，那么它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

100多年后，中华民族早已摆脱了列强欺凌、山河破碎的屈辱；如今，我们正昂首迈步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谆谆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既曰“命脉”“根基”，又曰“源自”“孕育”，提示我们越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是要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守护好维系国运的“中国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度自信地走出一条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中国道路，才能高度自信地输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元素。

军事文艺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在宣传我党思想、展示我军形象、激励官兵斗志、提升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成就举世瞩目。而今军队改革正日益走向深入，军队文艺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愈发艰巨。相应地，对于文艺战士的思想人格建设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我军文艺战士如何才能拥有“第一等襟抱”以不辱使命？不可或缺的，就是要把握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洋，积极汲取那些足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有”革命军人理念的民族文化精神，认真领悟，深入研究，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为滋养自己人格成长的沃土。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人们“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纵览数千年古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以惊涛拍岸的力度书写爱国情感，早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写作传统，历史上甚至出现了终其一生不断抒写爱国主题的诗人，比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钱锺书在其《宋诗选注》一书中盛赞陆游道：“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

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鹤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陆游辞世前写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以充沛的爱国情感，激励着广大官兵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而寸土必争、战斗到底！

今人编选有多种古代爱国诗词读本，较有代表性的如郭必勋与冯济泉选释的《历代爱国诗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靳极苍著的《中华爱国诗词详解》（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周振甫编注的《一百首爱国诗词》（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据笔者统计，军事题材的爱国作品在以上选本中所占篇幅均超过50%，比例高者甚至达到了73%，这说明军旅诗词实乃中国古代人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写作者如屈原、曹植、鲍照、李白、王昌龄、王维、岳飞、陆游、辛弃疾、林则徐等，均以军事题材作品的写作登上了他们所处时代爱国主义的文学顶峰。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忠诚报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军收复旧山河，朝天阙”……诗词中的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争先恐后地杀敌立功，忠心赤胆，报国心切。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尚武与血性。“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诗词中的军人以从军为荣，以杀敌为乐，精武强能，蔑视困难，老而弥坚，威慑敌胆。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牺牲奉献。“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词中的军人不惧个人安危，成就民族伟业，刚烈不屈，义薄云天，勇于献身，至死不渝。

作为古代军事文艺的接力前行者，部队文艺工作者理应向古代先贤那样，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高扬爱国主义大旗，积极从他们作品中汲取报效国家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出挺立时代潮头的精品力作，使军事文艺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三

对于中华民族诸多“永不褪色”的思想和道德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曾有精辟的揭示。他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积淀着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英豪的光荣历史，闪现着他们勇攀精神高峰的坚毅神情，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 塑造精神世界的“雪拉山”

——关于长篇小说《雪祭》的对话

□党益民 耕 云

耕 云：前不久，中宣部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揭晓，您的长篇小说《雪祭》获此殊荣，本局只有2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向您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感谢您为当下的军旅文学争得了荣光。我想，这也是继《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之后，雪域高原给您的又一个馈赠。当然，这个馈赠的底色，是您的高原生活岁月，以及您40余次进藏的传奇经历。最近您又进藏展新，回到自己精神的“原乡”，回到曾经那么熟悉的“雪拉山”，也许感慨更深。

党益民：是啊，西藏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我曾经在《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得鲁迅文学奖后的颁奖典礼上说过：这些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的西藏战友们一起写的，我只是用手中的笔，而他们用的是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书写。这些奖也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更是颁给那些长眠在雪山之上和现在仍然战斗在高原上的战友们。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就是为了用这些书祭奠长眠在西藏的战友。这次重返西藏任职，我更是感慨万千，当天晚上彻夜难眠，写下一首长诗，其中一段：如今鬓如霜/老兵返西藏/心儿撞击胸膛/泪水冲出眼眶/军人的不哭/却难掩一腔悲壮/一路仰望/又如如血的笑容/守护的进藏路啊/每一公里都有战友的英灵在守护/我怎忍心用脚去丈量/我匍匐在冰雪之路上/亲吻冰冻的土地/感触西藏血脉的搏动流淌……这几句，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艾青有一句震撼心灵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此土地爱的深沉。”这句诗刻到我心里去了。是的，我爱西藏，我爱那里的高远与洁净。

耕 云：《雪祭》围绕一个军人家庭父子两代军人展开叙事，讴歌了两代西藏军人的使命担当，呈现了两代军人积极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展示了藏地近半个世纪来的深刻变革与发展，比您此前的作品更丰富、更宽博、更厚重、更震撼。据说，这部作品您酝酿了20多年，这么长时间的情感积累，一定有很多故事之外的故事。正如雷达先生评说的那样，一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在血液里激荡，随时都会冲破胸膛”。

党益民：这部书的时间跨度有六七十年，包括和平解放西藏、蔡生忠筑路大军、康藏筑路大军以及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等西藏重大历史事件。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们陕西富平县上千名新兵走进西藏，他们参加了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100多人牺牲在了西藏。这些，我在西藏和老家专门做过采访调查。我原来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队（原基建工程兵），先后改建了青藏、川藏、新藏、那昌、中尼等进藏公路，这几条路的修建我曾参与过，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的牺牲。可以说每一公里

进藏路上，都有一个共和国军人的生命在守护。20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了，但因为亲历太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2013年底，我离开边疆去辽宁工作，对边疆的情感反而更加浓烈，感觉再不动笔把这些西藏往事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些死难的战友。我用了一年时间打腹稿。2014年秋天，我利用在海边疗养的20天时间，在零海拔的地方，一口气拉出了初稿。后来，我又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断断续续对初稿进行了修改，2015年底完成全部书稿。

耕 云：您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批判性、颠覆性、普适性、现实性和影响力，在《雪祭》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来逼近和实现这种理念的。

党益民：一部好的小说，首先要要有可读性。你写的书读者不喜欢，看不下去，那你写它干什么？第二需要紧贴现实，紧贴人物，要揭开人性最隐秘的地方，这样的作品才能走得更远。第三，写作需要有实证精神，不光对您所描写的内容特别是细节要认真求证，更要有探索、追问、辨析灵魂世界的能力。小说难在独特，难在与众不同，但又不是简单的、猎奇的、无根基的独特和与众不同。别人用这种腔调写了，你就要避开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自己的表达。不要把“难度”理解为“难读”。《雪祭》里的人物不是一对一的现实存在，而是许多战友的重新排列组合，是一种典型概括，但故事情节特别是细节都是真实的，都是我所经历过的。故事可以虚构，人物可以组合，但细节不能虚构。一个失真的细节，可能会使整个阅读信任的大厦轰然倒塌。小说需要节外生枝，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要善于走弯路、走岔路。有评论家说，《雪祭》具有真实的力量。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遮掩矛盾，没有刻意美化那些平凡的高原军人，他们有缺点但却仍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他们有些参军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现实，他们中有些人一心机穿上“四个兜”（军官），吃上公家饭，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人”。但是他们在严酷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军人。

耕 云：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不喜欢过分修饰语言的作家，您的文字质朴简洁，但却是蘸着血泪写出来的心灵史。特别是您作品中多有战友牺牲的情景，也许是您亲身经历的生死劫难，总是充满着撼人心魄的力量。比如《一路格桑花》里的王力，《雪祭》里炊事班长兰洲，从死亡线上走回来的赵天成，以及那些牺牲战友的坟墓……

党益民：写书是为了让更多人去看，所以最好采用更多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不喜欢浮华，

不喜欢玩弄词藻，我喜欢沈从文、汪曾祺那样的表达，非常质朴简约。海明威说：“要平铺直叙，少用形容词、副词修饰；用具体生动的词，不用抽象的词；表述直截了当，质朴无华。”写作和做人一样，要质朴可信，这样才便于交流。写作就是和读者交流。小说里的人物，是我过去战友中的一个或多个的组合，他们想些什么，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都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在阿里无人区，我遇到过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她们怎么也揩不净自己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与无奈，那一刻我就是她们。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肺水肿长眼不醒，她的婚礼变成了葬礼，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残忍。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母子在营地苦苦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那一刻，我从妻子的哭声中知道了什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一个陕西同年兵，我们上午还在一起，中午他去执行任务，他的车子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个月后才找到半具遗体，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惟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

耕 云：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您笔下的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我想，正是这种不刻意拔高，这种平淡克制，才呈现出高原军人的伟岸，这可能也是您对英雄的表达。

党益民：我们的军魂就是听党指挥。军人的代名词就是冲锋陷阵、牺牲奉献。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点，但是在关键时刻，在最危险困难的时候，人会舍生忘死，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置身时代冷暖之中，深入部队基层一线，作品才能从“立言”到“立心”“立命”，才能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时代民族精神和正确价值取向，是文艺作品的灵魂。经典的文艺作品，无不打上作品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精神标签。背离历史真实，脱离时代风尚和社会实践的作品，很难被读者接受，也很难成为精品力作。“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把握时代脉搏，扎根脚下土地，固守高贵，坚守精神，才能写出有道德、有温度、有血性、有筋骨的好作品。作为一个军旅作家，应该责无旁贷地将目光聚焦在军队改革和强军实践之中，塑造出新一代“四有”军人形象风采，唱响强军兴军战歌。

（党益民 军旅作家，武警西藏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出版10余部文学专著，曾获鲁迅文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王诗敏和潘庆华主撰的《大国军魂》，可以说是我久期待的一部著作。作为一名戎装在身多年的老兵，因为阅读这样一部字字叩心的书籍，心里不免有一股热血和激情在升腾和奔涌，这不仅是因为我军有着90年的苦难与辉煌，使我们时时为其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也因为总能断续听到各种惑乱视听的杂音与喧嚣，内心的愤慨可谓久难平。我们从书中读到作者对大国军魂的解析，响彻的是令人振奋的浩然正气和强劲旋律，相信能给读者以深刻而强烈的启迪、冲击与震撼。

中国共产党人从其缔造人民军队的那一天起，经过数不清的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上下求索和浴血奋战，将一个民不聊生、衰败不堪、任人欺凌与宰割的旧中国，造就成一个日益强盛、欣欣向荣、逐渐重塑荣光的新中国。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壮丽的进程中，我军经历了90年的奋斗与牺牲，饱尝了90年的悲壮与欢乐，拥有了90年的创造和积累，使一个羸弱病态的民族在挫折、血火和抗争中，实现着艰难的蜕变和痛苦的涅槃，使中华民族以她应有的姿态伟岸地挺立于世界之林。尽管我们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困顿与不幸，但我们仍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来肯定和赞美我们的党、国家、人民和军队在90年中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

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让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充满了无限的喜悦，然而这一切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看到的。在各种信息传播越来越发达便捷的今天，我军的性质宗旨、征战历史和英雄人物等，常常被各种或隐晦或放肆、别有用心奇谈怪论所抹黑和诋毁。这种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虚妄之词，妄图颠覆、歪曲、消解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有特别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的人民军队的历史，及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精神魂魄和思想内核，其目的是试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特别是新生代的年轻人，陷入某种真假莫辨、随波逐流的迷思之中，使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国家，被不应有的混乱、倒错和撕裂的观念与认识所支配、困扰，从而迟滞我们本应昂首前行的脚步。

《大国军魂》的作者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与军队，对历史、现实与未来负责的使命感和正义感，来进行这部书的构思、选材与写作的。其按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宏大的主题，从我军90年的漫长历史中，精心提炼出其中最为宝贵的精髓，并将之贯注凝聚在这部具有铁一般质感的著作中。这就是由这样一些关键词来组成的，诸如忠诚、信仰、力量、智慧、胆魄、精神、牺牲、胜战、军纪等等为我们所特别熟悉的元素，并围绕其展开雄辩有力的论述和叙事。这些元素看起来也许是为世界各个军队所共有的，但作品让我们读到的却是为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所独有、更丰富、更博大的内涵，是形成这支人民军队的钢铁骨骼与不同侧面、精神密码与光辉图谱，是其之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和伟大光荣的因由，也是任何恶意中伤、流言蜚语所更改、抹煞不了的。

令我为之赞赏的还有作品对“大国军魂”的精到阐释与准确勾勒。然而作者并非是单纯地进行形而上的理论陈述和空洞说教，即不仅以冷静透彻、鞭辟入里、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思考，对90年所铸造的大国军魂，溯清其来源，澄清其现状，指清其去处，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角度和眼光，让读者认识一个清静朗明、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世界。更在于在作品中采用与列举大量新颖生动、丰富雄辩、毋庸置疑的事实，来做高视点、多维度、深层次的透视与描绘。其所披露的更为精确和崭新的事实与素材，无论是宏大壮阔，还是细小精微，都使我们能从所熟知的或不熟知的史实中，获得新的感受、认知和理解，产生新的触动、震撼与喜悦。如果作者们不将与此相关的一切尽收眼底，不通过自身的博观约取和深研细究，是很难实现其初衷，使之成为一部有着如此振聋发聩、震古烁今的思想力量的作品。

可以说，这是一部带着火一样炽热的激情、冰一样澄澈的理性撰写的著作，输送的是正能量、唱响的是正气歌。作品带领我们再次重温与认清我们这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其征战史上，诞生过多少英雄豪杰，创造出多少传奇神话，积累下多少精神财富。他们相信这90年血雨腥风、壮怀激烈的历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对于我们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具有无穷价值的宝贵遗产，而这些遗产又是亘古未有、无可取代的。因此一代代人军队的领袖和将士的撼天气概、苦难风流和卓越辉煌，都应作为民族最伟大丰硕的收获和贮存，值得备感珍视和发扬光大。本书作者们的写作冲动与灵感，正来源于从我军历史中所获得的无限钦佩、巨大力量与高度自信，而这一切都充分地渗透和洋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让我们清晰地看清他们对于这支军队所具有的强烈而深厚的热爱之情。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一部正名纪实之书，更是一部砥砺前行之作，它对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实现中国梦和强军梦之路上的广大军队读者来说，必定会起到巨大的教育、感染和激励作用。

同时这是一部在文体上也颇具特色的作品，其叙事说理的精心与精详，行文走笔的灵动与简洁，使之具有了摇曳生姿、文采灼然和意趣纵横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其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我军历史发展轨迹融于一体所熔铸成的“大国军魂”的概括与阐释，既是高度浓缩的，又是深入浅出的，有着很强的思想性、可读性和说服力，它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磅礴奔腾、直击人心、不可抗拒的气势和力量。因此我愿意把《大国军魂》这部书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它、了解它、喜爱它。

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和”，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至关重要。从传统文化思想出发，挖掘并阐释“和”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人格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崇尚和谐。从传统文化中的“和”的理念，学者汤一介认为可以推导出一个“普遍和谐”观，其内涵包括“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层面。其中“人与人的和谐”，落实到军队文化建设层面，就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古代兵书对此多有阐述，如《吴子》说：“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只有搞好军队内部团结，才能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与历史演义小说不乏对这一题旨的展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将相和”故事。蔺相如在解释其何以对负气气胜的廉颇，一再退避忍让时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一旦醒悟过来，便能放下架子，主动认错，负荆请罪。军队文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些熠熠闪光的思想精华，大力表现当前强军建设中我军官兵促进团结、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以推动军队全面建立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其次崇尚和平。在儒家“和为贵”“协和万邦”思想的影响下，秦汉以后我国传统军事文化逐渐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主导意识。历代军事诗文也多持“非战”立场，控诉了战争暴力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如汉乐府《战城南》的“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乌可食”，曹操《蒿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世代延续下来的非暴力态度，给一位到达中国明朝的西方人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敏感捕捉到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渴盼远离战争的善良心态。

当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并不惧怕战争，虽然厌战，但绝非轻战。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虽然揭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绝不像当时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增强军事实力，对敌人造成巨大的威慑，让他们闻风丧胆，不敢来犯，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的理想境界。长期以来，崇尚“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我军官兵的血液，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惜流血流汗，殚精竭虑，刻苦训练，就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其最终的目的则是奔向美好的永久和平。对此，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领悟，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军官兵的战斗文化心理，真切塑造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军事文艺惟有把握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才能无愧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新时代。

——读王诗敏、潘庆华主撰的《大国军魂》  
□汪守德

强国强军正气歌